

現代中國小說研究在西方

——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

主講：王德威*

整理：林宗毅 袁美敏

今天我所要談的是目前西方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方向與應用方法的轉變，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西方歷史非常短，主要是從1961年開始。在此之前，固然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文學作了一些零星的研究與翻譯，然而，直到1961年耶魯大學出版夏志清先生的《現代中國小說史》，才算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打下理論的基礎，在文學史方面的考察也才有新的脈絡出現，該書可說是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理論化與歷史化的開端。此書經劉紹銘先生主譯，已由傳記文學社出版。

《現代中國小說史》一書所探討的範圍，係1917至1949年間自魯迅以至張愛玲的小說發展。此一年限亦大致符合我們對現代文學斷代的觀念。夏先生在書中廣泛應用了西方新批評及李維斯（Leavis）理論的角度，有時也不免生硬的採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重新評估現代文學的發展。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包括對魯迅的重新評估。蓋自1930年代以來，魯迅經過中共神話性的塑造後，儼然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理論家與實踐家；在意識形態上，魯迅所代表的左派思想也被奉為正宗。夏先生此書從政治觀點而言，固然較為保守，對魯迅有不同的評價，這些批評觀點在後來引發許多爭議。除此之外，一些在今日被視為重要作家，而在1960年代早為批評者所淡忘或置諸二、三流的，如沈從文、錢鍾書等，在夏先生書中皆予以重新評價，乃至關專章討論張愛玲的成就……等，都是當時前所未有的觀點。故至今八〇年代我們談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都應回溯到夏先生撰作此書的發掘之功。

* 王德威先生，現執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擔任現代文學課程。本文係王教授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十六日至本所專題演講之演講稿，由本所臨時助理林宗毅、袁美敏據演講錄音整理，並經王教授修正而成。

夏先生此書的第二個特點在於感時憂國精神這一觀念的發揮。感時憂國一詞 (obsession with china)，夏先生指出現代中國的作家，尤其是三〇年代的作家對中國的關懷，對中國當時社會現況的描述，可說已臻於一種執迷的情境了。這樣一種寫作的觀點，從好的方面來看是凸顯了現代中國文學一種強烈的道德執著；然而從壞的一面來看，如此對中國的過分關懷，無形中限制了作家的想像力，造成對探討現實、包容人生不同層面的一大障礙，等而下之者，可謂使文學淪為道德宣言的附庸，或意識形態的宣傳品。這種現象在1942年毛澤東延安座談後，成為左派或中共文學的主流，一直到1970年代方才有所轉變。故而感時憂國這一觀念的發掘與定義，可說是此書另一重要貢獻。

夏先生此書第三方面的貢獻在於方法學的運用。夏志清先生畢業於耶魯大學英語系，在轉入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前，對於英美文學造詣極深，甚至可說遠在於其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之上。(這一點，個人亦有類似的背景，因此，也深知個中局限。)然而，純粹從方法學觀點來看，夏先生此書無疑提供了許多新的借鏡。例如，在五〇年代西方盛行一時的新批評方法，強調文學研究應重視原典的閱讀，注重文學風格、各種結構、人物、情節上的細膩研究。這些在《現代中國小說史》中皆可看得出來。另一西方文學的批評傳統，為李維斯 (Leavis) 所提出的「大傳統」的觀念，亦是由夏先生引進到中國文學研究中來的。李維斯從三〇年代始即為英國文學的重鎮之一。他所強調的文學與人生的直接關聯，以及文學作品為人生各種現象的具體表徵等觀念，都經由夏先生的詮釋帶入中國文學的研究中。所以，在夏先生所著《現代中國小說史》一書結論中，特別以專章論述文學是不可能脫離人生的；文學就是人生各種情境最精緻與具體的表現，我們不應對文字本身產生任何質疑；一個好的文學應對人生有相當建樹性的看法。

我們今天從後現代、後設或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像如此強調文學與人生關聯的文學批評理論，可能覺得已稍嫌過時。而且所謂人生究指人生的那一方面？所謂描寫人生應如何描寫？或從何種角度去描寫？其中又牽涉了什麼樣的歷史或政治問題等等。這類的疑問都在過去幾十年內逐漸興起。在1960年代初期，無疑地，這本書無論是在方法學上或在文學史的重新劃分上，作出了許多新的貢獻。這一派的文學研究方式，在後來也有不少美國學者承繼了此一傳統，其中最著名者為劉紹銘教授。劉先生至目前為止仍強調文學與人生之間緊密的關聯性。而文學本身作為一個在社會中象徵性的活動，其所牽涉到的思想與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以及語言本身作

爲文化或文學傳播的媒介性的問題，都暫時存而不論，這一類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還是有其意義存在的。

其次在1960年尚有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歐洲漢學家——普實克（Průšek），其貢獻在我們今日從事現代文學研究也非常值得重視。普實克屬捷克籍，其門下學生包括後來十分活躍且曾數次來臺的高立克（Gálik），在加拿大任教的 Doleželová-Valingerová。他們這個捷克學派一方面受到了馬克斯美學的薰陶，一方面受到三〇年代俄國與捷克形式主義的影響。因此，在分析小說時特別著重小說形式本身一些特別的轉換與推陳出新的社會現象。這個研究的高峯到了1980年初由 Doleželová-Valingerová 所編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亦即《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小說研究》一書達到了高峯。普實克本人對於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從五四以來，我們覺得現代中國文學是相對於傳統文學的一個全新語言或文化流變的陳述。對於普實克來說，這一說法固然有其根據，即中國新文學的確有其新的一面；但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些影響，仍十分值得重視。對他而言，中國古典文學對於現代文學的影響主要是抒情情境的發揮。此一抒情情境，特別是詩的情境的發揮，並不是很簡單的表達在中國現代詩的創作上；而非常有趣的是，這種主觀的、詩方面的、強調主體性表達的一種文學情境，卻表現在小說的發展上。所以，他有幾篇相當有名而值得爭議的文章，強調中國現代小說主體性，並不見得是來自西方的影響，而主要可能是中國古典詩中主體性的表達，重新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找到了新的發展媒介。所以，他有幾篇論魯迅、郁達夫的論文，相當值得注意。

第二點，普實克將強調文學主體性的傾向，亦即 Lyrical 的傾向，與另外史詩式 epic 的傾向，作一新的結合。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普實克受到東歐理論的影響，尤其是我們現在很流行講新馬克斯主義，而新馬的老祖宗像盧卡契（Georg Lukács）等人的影響。對他而言，史詩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必須要有一種史詩性的關懷，才能真正和歷史、社會中各種變化相結合，而獲致一個新的起點。所以，在1960年代普實克於哈佛大學任教半年時，有一位中國學生——李歐梵先生，曾爲普實克編了一部書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史詩的或抒情的》）。對於大家而言，普實克最大的貢獻，在於將這兩種西方文學的觀點以中國文學的方式重新再作評估。

第三點，六〇年代普實克的貢獻，在於把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用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應用在現代中國文學的討論上。這個方向牽涉的問題相當多，故在此並不多作介紹。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普實克與夏志清兩人在1960年代末期有一場非常重要的論戰。雙方互指對方沒有科學的精神，強不知以為知，對現代文學作了相當程度的扭曲；雙方皆標榜各自的研究是最客觀的，也是最科學化的等等。這一場文學公案，是今日從事現代文學研究者必須研究的，因為這代表了東歐與英美學界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相互間的對陣。

有兩本書可作為這一階段研究與討論的借鏡。一本是李歐梵先生編寫，197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的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現代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一代》），在此一大標題下，李歐梵是以斷代問題為主，指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新的方向。因為在夏志清與普實克的研究中，基本上所強調的是寫實主義的方向。然而，對李歐梵而言，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不論寫實、象徵或其他任何主義，基本上呈現的是一種浪漫的傾向，故在這裏，「Romantic」不只是指一種創作風格，更是指作家在表現上的一種姿態的總稱。因此，李歐梵在本書中介紹了一系列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從林紓開始一直到後來的郁達夫、徐志摩、蕭紅、蕭軍等人，同時也提到一些現代「文人」的觀念，他們在文學上不見得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們遊走於上海或北京的文壇，或特立獨行，或從事出版雜誌等活動，對現代文學及文化，影響深遠。他們在各種姿態與表面上或許不同，但對於藝術、文學，內裏卻常有共同的思維及創作特徵，十分值得注意。所謂浪漫的一代對於七〇年代初期中國文學的研究，又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

另一本書是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s era*（《五四時代的中國文學》），此書緣於1974年在哈佛大學召開的一場以五四文學為議題的會議。此一會議網羅了當時在美國的一些重要學者，如 Cyril Birch、夏志清、李歐梵等，會中對五四作了相當新穎且具爭議性的報告，所有報告在1977年結集出版，為現今從事現代文學研究之學者所必讀的一本重要著作。這本書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廣，主要討論了魯迅、茅盾、丁玲、郁達夫等人。雖然範圍不廣，不過它在方法學上，卻有相當大的示範意義，其中包含了捷克學派的學者，如高立克等，將東歐學派中的形式主義或以意識形態掛帥的研究方法引進美國；而在美國國內也有許多學者，如夏志清提出新批評方式，李歐梵則提出文學史的方式，兩者影響都相當深遠。大致上，可以作為1960、1970年代美國在中國文學研究發展上的指針。

另外，還有一本書，性質相當特殊，作者是夏濟安，書名叫 *The Gate of the Darkness*（《黑暗的閘門》），是夏先生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研究時所寫的報告成果。就他自己來講，他並不滿意這本書的內容，但我個人以為，姑且不論其內容如何，只就他的處理方式而言，還是相當值得借鏡。這本書寫的是左派作家在二〇年代至五〇年代的一些重要文藝及政治活動。夏先生有相當強烈的批評立場，覺得這些作家的「成就」多半乏善可陳。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居然能以一些巧妙的方式把極不有趣的資料組織成一篇篇有趣的研究論文。尤其是討論到1930年代左派所謂「五烈士」如何與政治牽扯在一起，一躍而為中共文學史上第一批最重要的作者等等，非常精彩，到後來他談到五〇年代中共的小說千篇一律，但他在其中還是找出了有趣而微妙的變化。因此，我認為這本書在研究中共文學上具有相當程度的示範意義。

接著，我要講的是八〇年代以後，就是當代西方在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一些新的發展：

八〇年代以後，因為政治情勢的轉變，一時間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變成相當熱門的學科。首先，我要介紹的是作家本身的專門研究，對象包括丁玲、蕭紅、沈從文、茅盾、錢鍾書、巴金、老舍等，都有專書出版。其實，巴金與老舍的研究專集在七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那麼丁玲的研究呢？則開始於梅儀慈（I-tsi Mei Feurwerker）。她第一次討論到中國女性作家的貢獻，運用了許多西洋的方法，巧妙地與丁玲的作品融合在一起。缺點是篇幅太短，無法作詳細的討論。再者，我個人對丁玲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一直有一種愛恨交加的感覺，也就是說，也許她做為一個「革命家」或一位「女作家」，這個「標籤」所代表的意義，可能會比她的文學成就本身的意義來得重要。丁玲在八〇年代以後經過女性文學批評家的「興風作浪」，論文一篇又一篇，可以說是把丁玲給炒紅了。然而，相當可惜的是，從二、三〇年代以來，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如：凌叔華、蕭紅、四〇年代的張愛玲等，幾乎到目前為止都還沒受到美國學者的注意，更不論馮沅君、陳衡哲、盧隱、石評梅、羅淑等人。如果，他們只是在耍弄一些女性主義批評的字眼，不去實際發掘、重估這些作品，卻遽下結論，謂丁玲是我們唯一重要的女作家，這是相當可惜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書是金介甫的（Jeffrey Kinkley）的《沈從文傳》。我們知道沈從文從1949年以後就封筆不再創作小說，在文革時受到相當大的迫害，後來卻居然成了中國古代服裝史的專家。到六〇年代初期，中共對沈從文的研究可以說完全消聲匿跡了。七〇年代後期，中國大陸文藝氣氛稍為活絡以後，沈從文研究才又

露出曙光來。可以肯定地說，到目前為止，金介甫這本書以自傳、文學史的觀點來看，是最扎實的一本書。書中對沈從文的背景及他在二、三〇年代的文藝活動有相當詳細的介紹。而最值得稱道的是書末的書目。這本書是對沈從文在八〇年代西方的現代文學研究裏面重新被定位的一個極重要的表徵。

關於魯迅的研究，我也在這裏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魯迅一直是中國大陸在國外推廣文學的重點，幾乎算得上是一門「魯學」。其實，魯學到了國外以後，表現得也相當有限。八〇年代初期萊爾（Lyell）在史丹佛大學教現代文學，寫了一本 *The Vision of Reality*（《魯迅的現實觀念》），寫得實在平平，等於只是情節的介紹而已。中期以後，李歐梵編了一本書，叫 *The Legacy of Lu Xun*（《魯迅的遺澤》），把魯迅在政治、思想活動、傳統文學及現代文學研究各方面，做了非常精微且在理論上也極具爭議性的論述。參與這本書的編撰學者，除了李歐梵之外，還包括林毓生，他討論的是魯迅在思想史方面的貢獻；也包括谷梅（Merle Goldman），她專長是在政治史上。總之，我個人覺得這本書相當值得借鏡。

後來，李歐梵又出了一本書，叫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來自鐵屋子的聲音》），完全以傳記式處理，寫得十分細緻平穩。不過，李歐梵對魯迅仍懷有相當大的敬意，所以有些關於魯迅爭議性比較大的問題，他都不免予以淡化。在對魯迅背景、作品的分析，可以說是截至目前西方研究魯迅最周詳的一本書，很值得介紹或譯成中文。至於錢鍾書或者是老舍的研究都只是止於介紹性。巴金的研究則有 Olga Lang 的專書，也算得上是一本相當好的書。雖比較沒有批評上的見解，可是做為史料的研究來講，也是值得推薦的。

在八〇年代還有一些專題性的研究，如林培瑞（Perry Link）對鴛鴦蝴蝶派的研究，完全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鴛鴦蝴蝶派小說在二、三〇年代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另外，還有從比較文學的影響來研究的，像加州 Davis 大學的吳茂生寫的 *Russian Hero in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本介紹現代中國作家如何受俄國作家，從果戈里、屠格涅夫開始一系列的影響，探討俄國的知識文人人物、畸零人或者是革命英雄人物等角色，被轉嫁到中國文學以後所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變化，寫得相當有意思。但也有人對吳茂生本人的俄文造詣及所接觸的二手資料的周延性，提出批評。

斷代研究方面則有康乃爾大學教授耿德華（Edward Gunn）的 *The Unwelcome*

Muse（《不受歡迎的繆斯》），主要寫的是上海淪陷時文學史的一個現象，他也提到了張愛玲、錢鍾書等人，這本書在考證上可以說相當詳實，但比較缺乏批評的觀點。還有一本書是1990年由耶魯大學東亞系任教的 Marston Anderson 寫的 *The Limits of Realism*，是以文化及意識形態批評為出發點介紹中國文學。他強調現代中國文學主流是寫實主義，而寫實主義的主流又是批判的寫實主義，他把整個現代中國小說放在這個主流上來看，總共探討了四位作家：魯迅、葉紹鈞、茅盾、張天翼，運用了西方法蘭克福學派及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來檢視現代的中國文學，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見解。這本書也有它的限制，因為 Anderson 把寫實主義看成是唯一的，只有批判的寫實主義才是寫實主義，無形中限制了中國寫實主義在三〇年代各種各樣的發展；而所討論的作家當然也經過高度的選擇性，在選樣上自然有它的限制在。

另外，還有一本周蕾寫的，於1991年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的 *Chinese Woman and Modernity*（《中國現代化與女性》），是目前為止在國外以女性主義為批評方法的著作中寫得最好的一本書，而且也是火氣最大的一本書之一。她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長久以來以男性為中心的一些批評者。從夏志清到林培瑞，她都有相當嚴苛的批評。周蕾本人對新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新佛洛伊德等理論和方法都有相當程度的研究，所以綜合起來，這本書不只是值得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及學生參考，一般對文化史、思想史有興趣的，也都值得借鏡。這本書共分四章，比如第一章就用了《末代皇帝》這部電影做開端，從批判電影媒體、東方主義、女性主義及現代中國文學的某些限制起，有很多極精彩的批評。

關於當代文學的研究，即八〇年代的文學研究，在美國可以說是一窩蜂，因為自從大陸開放以後，學者們有了新的接觸，而且八〇年代的文學的確又有許多值得借鏡的地方，於是，許多學者就迫不及待地寫這一類的研究書籍。就我所知，目前有好幾本這類的書馬上就要出版了，其中一本已經出版的 *Blooming and Contending*（《鳴放》），作者是 U.B.C. 教中國文學的教授杜邁可 (Michael Duke)。這本書主要是討論從1979年以後的傷痕文學一直到八三、八四年這一段所謂新寫實主義的重要作家，包括戴厚英、劉賓雁在內。本書雖有參考的價值，但因為史料考證方面存有相當多的漏洞，曾引起很多的批評，故只能說是研究大陸文學的一個起點。凡此種種，無形中改變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方向，所運用的方法五花八門，從新馬、佛洛伊德到其他各種媒介式如電影、文化的批評、還有結構主義等，把現代中

國文學的研究帶向另一個高峯。

相對於這個，在八〇年代有幾次非常重要的文學討論會，每一次會議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而言，都有某種程度的推廣。在這裏我介紹四個較重要的會議：

第一個會議是 1986 年在德國哥斯堡召開，是由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劉紹銘和博宏大學教授馬漢茂合辦的，會議網羅了歐美、臺灣各方學者齊聚一堂，我也躬逢其盛。這個會議有一個動人的題目：“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現代文學的大同世界」），沒想到這個會開完了以後，大家反而覺得沒有什麼大同的可能，後來編了一本選集，選集的題目非常具有反諷味道，叫 *Worlds Apart*（《分崩的現代中國文學》），這個會的意義在於第一次由有心的學者把海外的學者聚在一塊，也有一些臺灣作家，像李昂是去了；陳映真、黃凡則臨時爽約。大陸當紅的一些作家，如楊煉、張辛欣、李陀也都去了。第一次有一個機會以比較客觀的態度來討論現代中國文學的走向。但會議的結果，在純粹學術的立場上，我想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書名會變成《分崩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原因之一。到了 1988 年在捷克，普實克的學生高立克又辦了一次大型的會議，主要參與者多半都是方法學上比較保守的一些學者，在討論的對象上都偏向於我們過去已經認定的重要作家，討論方式傾向於普實克、高立克稍帶點意識形態及早期形式主義批評的問題等等，不算是特別成功的會，但還是有它存在的意義，代表了東歐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仍然是生機蓬勃的。

到了 1990 年，哈佛大學也舉辦了一次盛會，當時我在那兒教書，與威斯康大學的魏艾蓮 (Ellen Widmer) 同是這次會議的主辦人。這個會議的宗旨是企圖把八〇年代的中國文學和五四傳統做一連鎖性的研究。會議規模相當大，共邀請四十多位學者與會，地域不同，討論方法更是五花八門。雖然，基本上與會學者都很努力、很用心地寫，但身為主辦人之我的我卻覺得：很熱鬧、但相當地不痛快，主要原因是海外學者目前雖有許多方式可以接觸到不同的第一手資料及有不少大陸作家來訪問等等。然而，一談到研究的時候，就如同劉紹銘教授講述的一樣，脫不了「觀光主義」的心態，比方今天我們捧那一位作家，大家一窩蜂都去研究這位作家。例如前幾年大陸捧王安憶，一下子在美國的學者一談到女性主義作家，除了王安憶以外，好像就沒有其他人可以討論一樣，這是相當窄化的一個現象，尤其對於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講是相當可惜的。此外很多的研究者抱著「大中國」的思想，就是說要研究大陸或當代中國文學就非得到大陸取經不可。像我們是從臺灣出來的，則覺得

如要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從一個比較大的角度來看，如果不去提六〇、七〇、八〇年代初期的臺灣（女）作家的貢獻，那麼這樣的研究就會顯得單薄。另外，我們對於五四的反省可能還不夠，甚至我覺得當今在海外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學者的態度，可能要比五四作家在寫作時所秉持的態度還要保守得多。今天我們講到的作家無非是在批判的寫實傳統裏面，魯迅仍然是許多人心嚮往之的對象，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但也有好的一方面，就像沈從文的成就的認定，有好幾篇論文都針對沈從文重新估量他的成就，這是值得一提的。至於，對臺灣的認識，他們就非常有限了。在這裏，我講講我個人當時的經歷，大家就可以明白：

當時一共提交二十五篇論文給大會，其中有二十四又三分之一是討論中國大陸作家的，另外三分之二是我寫的，討論了幾位臺灣作家，包括宋澤萊、李永平在內，企圖把鄉土文學和臺灣的鄉土和八〇年代的鄉土以及大陸的鄉土作一個連鎖。得到的反應卻是：多半的學者並不知道臺灣的鄉土運動。我這篇文章的講評是英國的 David Pollard，他以一種非常犬儒的口氣暗示：臺灣根本沒什麼東西，我何必多費唇舌？當時的我，深深覺得受到污辱。他在會場上還特別唸了一段李永平的作品，然後以一種訕笑的態度說：這樣的作品，連文字都寫不好，我們怎麼能夠拿來當做是當代中國文學的傑作來討論呢？當時我聽了，簡直是愣住了。因為李永平對我們來講，雖然文字非常怪異，但這種怪異是特意為之的，可以說是相當具有特殊風格的作家，而西方學者因對臺灣文學認識不夠而有所誤解，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公平的。我無意標榜臺灣本土意識，但我覺得現代中國文學如果要求取它的多樣化或是以不同的角度來看，以目前的成績而言，還是不夠全面。

基於以上的原因，所以在1991年時，又由鄭樹森、劉紹銘、葛浩文等人在科羅拉多大學發起另一場臺灣當代文學討論會。這次會議是特意針對臺灣文學過去六十年的發展和貢獻予以重新評價。

在研究方向上，我覺得未來有三個方向值得注意：第一個方向是關於城市與鄉村。就我所知有許多篇博士論文都圍繞這一個主題作探討。有一位芝加哥大學博士班剛畢業的研究生寫的論文是關於上海城市文化，寫得非常精彩。另外，我在芝加哥大學開會時遇到另一位專門作臺灣城市文學的女研究生，她所討論的作家甚至包括目前的黃凡、林耀德，也算是很有意思的研究。對於鄉土文學的研究已經有很多人在進行，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做完整的鄉土文學史之類的大計畫出現。從魯迅開始，一直到四〇年代毛澤東延安文藝的向左轉，到五〇年代的趙樹理等人，

六〇年代臺灣的懷鄉、反共文學，七〇年代的臺灣本土化，八〇年代的尋根等等，這種鄉土文學運動史還沒有人做，但我覺得是很可行的方向。

第二個大方向是關於敘述形式做爲一個機構或機制的一種討論。也就是把整個文學的流變當成是一個大的敘述形式的流變來研究，有很多人已經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包括耶魯的 Marston Anderson 在內等等。甚至也把文學與電影連鎖在一起，例如周蕾的研究；還有在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教書的 Pickowicz 也把三、四〇年代的电影和小說做交互研究，這個方向實在大有可爲。雖然比較偏向於文學的技術層面，但並不只像過去單純的新批評式的技術性研究，而是把它變成更爲複雜、更牽涉到文化與象徵活動的一種研究。

第三種研究是女性主義的研究，還有文學的主體性或本體性的研究。不過，有一些批評家卻做得不夠技巧，硬生生把西方一些關於女性主義的理論套到中國女作家身上，使得女性主義的研究變得相當膚淺，這是很可惜的。我們不只有許多很好的女作家，還有男性的批評家、作者也都有很多關懷女性的作品值得去研究。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批評字眼上要功夫的話，可能會使未來發展方向多少受到一些限制。

最後，我以目前臺灣文學未來可能的一些發展方向做爲這次講題的結束。臺灣文藝早自六〇年代已經有有心人介紹到西方。在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劉紹銘和夏志清兩位先生編了一本書，叫 *The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1960-1970*，收羅了當時重要作家從白先勇到王文興、從王禎和到黃春明等，到目前爲止可能還是那個時代介紹現代中國文學的書裏邊最好的一本，翻譯的水準也相當整齊。七〇、八〇年代臺灣又各出了一本介紹臺灣文學發展的專門性選集，前者是齊邦媛教授主編的，後者是殷張蘭熙女士主編的。前者在涵蓋的範圍上，在今天看來是有點過時了，很多後起之秀的作品沒來得及收在裏面，所以這本書已經不足以代表目前臺灣文學的發展。至於它的翻譯品質也稍微有點參差不齊。殷張蘭熙女士主編的那一本，大體上是把 *Chinese Pen*（《中國筆》）雜誌上的文章收集在一起，比較沒有系統。第四本書是 1980 年代劉紹銘先生主編的 *The Unbroken Chain*（《不能夠拉斷的鎖鍊》），是第一本以文學史的觀念介紹 1930 年代至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包括了吳濁流、賴和、楊逵等人，也包括當今的張大春。這本書出來以後並沒有得到很大的迴響，相當可惜。另外，在編選時受到出版體例的限制，刪掉了許多精彩的作品，也是很遺憾的。至於廣泛批評方面只有一本，*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聊備一格。

在研究上，我個人以為我們可以做的，有下面幾點：首先，海峽兩岸這個問題，假如以文學史的觀點來看，是很值得做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歐美學者所做的研究都偏重於大陸。坦白講，除了少數重要學者以外，許多學者所做的研究都是屬於點的研究，不夠全面，缺乏文學史觀，而這方面正是我們可以來彌補的。尤其在言語上我們占了很大的便宜，可能有相當多的工夫看好的作品，同時也有很多工夫檢視不太好的作品，從文學史的角度重新過濾這些東西，尤其海峽兩岸四十年文學的流變上有許多相近而又不大相似的東西，都非常值得去探討。例如五〇年代的政治小說，海峽兩岸都出了很多，也許你會以為它們都是教條、八股式的小說，沒什麼好看的，其實未必盡然，它們之間有很多很有趣而又相呼應的地方，也有一些相異之處，都特別值得在今天這個政治狂飈的年代裏去重新思索。

第二點是現代與古典的關係。由普實克首開其端，但到現在還是做得不夠。一般認為現代與古典文學是兩碼子的事，似乎沒有可以銜接的可能性。其實未必盡然，因為文學的影響不見得是一種口傳心授、耳提面命式的影響，當年五四作家那麼強烈地反傳統，也可以說是對傳統的一種負面的呼應。對於很多類似這種負面式的傳承關係，也非常值得注意。更不用提一些表面上可以注意到的問題，像諷刺小說的問題或如普實克所提到的抒情詩如何轉化為現代中國文學主體性的表現等問題，都需要連貫古典和現代文學的訓練，才能有較好的成績。

第三，是對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重新定位的問題，亦即對文學作家或作品重新定位。這方面的批評一直很保守，現在我們所認定的大家仍然是三、四〇年代已經認定的大家，也許有很多次要作家也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去研究。有很多作品不見得在藝術情境上非常完美，但他們所揭示的許多問題到今天反而更值得注意。我覺得我們的態度不必那麼地保守，應該像五四作家那樣呈現一個多元化的局面。